

《中国观察之椿桦专栏》

“国际化大都市”不要拿老百姓来折腾



按照西安“国际化大都市”的建设要求,市民素质是靠强制与处罚得来的,这其实就是在折腾老百姓。国际大都市不是造出来的,而是在完善了市民福利的基础上,通过长期的科学规划形成的。如果不顾及民生而指望速成,必然形成怪胎。希望国内的“国际化大都市”先以民生的“国际化”为重。

最近“国际化大都市”再次成为热词,在媒体上频频亮相。据《华商报》6月22日报道,从今年起,西安计划用10年时间初步建成国际化大都市。西安市文明办、社科院近日发布的《关于加快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市民人文素养培育对策研究》对市民素质提出了要求,例如,到2015年,一半市民会说900句英语。

事实上,国内拥有西安市同样雄心壮志的城市比我们想象的要

多得多。前不久已有媒体报道说,在全国200多个地级市中,就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“国际化大都市”,平均算,每个省份要建5个以上“国际化大都市”。这个现象难免让人觉得,“国际大都市”好比仿制的LV包,男女老少都买得起。

对于西安市规划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一些思路,我捏了一把汗。按照西安“文明之城”的建设要求,市民素质是靠强制与处罚得来的。例如,高额罚款制止文明

陋习;英语推广计划。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:假如不强制,现有的国民素质远远达不到文明之城的标准;强制,则很容易伤害公民权利,尤其是英语推广,很多市民觉得就业与谋生比这重要得多。何况,许多人认为陕西人能说好外语就不错了。假如打造国际化大都市成就了强制性英语培训与“处罚经济”,这显然很恶劣。

根据当下国内少数城市的建设模式,提升城市国际化程度,往往离不开大兴土木、圈地运动,建设“世界第一”或“亚洲第一”之类的形象工程。而这样的建设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市民利益,例如拆迁。但这只是显性的影响,其实还有许多隐性影响被忽略了,例如,大量的财政用于建设硬件,结果导致民生投资长期不足,如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等。包括西安在内的许多城市,目前在国内尚属

欠发达城市,如果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时操作不当,伤及民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

其实以我所见,西安不妨向巴黎学习。巴黎成为国际大都市,主要是借助厚重的文化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巴黎人一向以说母语为骄傲,英语在巴黎及整个法国的普及率是非常低的。所以,西安应特别珍惜本土文化,没必要花大力气普及英语,也无须刻意大兴土木。事实上,世界上的国际大都市,都不是刻意造出来的,而是在完善了市民福利的基础上,通过长期的科学规划形成的。如果不顾及现实民生,而指望通过速成的方式成为国际化大都市,我看最多也只能获得光鲜的“国际”外表。希望,国内的“国际大都市”先以民生的“国际化”为重。

(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)

《第二落点》

是“国际化”还是“家长化”?

西安终于也进了“建设国际化大都市”之列——一半市民不仅要会900句英语,连中国唐诗宋词、歌德、普希金的诗都要“诵读”。还好,是“诵读”不是“背诵”。

看来,以后去西安可得先做好心理准备。一不小心失礼了,可能会被拉到学校学习当地礼仪。

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生活,朝九晚五后还要学习繁体字、学

英语、学古诗词,时间不够用啊。他们可能还会反问,讲英语、读诗词就“国际化大都市”了?忒简单了吧。是啊,怎么来看,建设“国家化大都市”任务都落在了市民身上呢?罚款针对的是市民,读诗学英语针对的是市民,学礼仪针对的是市民,政府呢,对政府的要求呢,不能就是拆拆房子、建建桥吧。

说来也怪,无论是要求“阳台不能晾衣服”,还是“统一建几十几尺的房子”,市民总是在一个劲地被“要求”着,不能这样,不能那样。似乎只有“像某某想的那样”,才是好样的。

市民讲英语,懂诗词,市容整洁,假若这也算是“国际化”,那也只是算是表面的“国际化”。如果公权时不时就“心血来潮”,办农

运会就要毁麦栽树,办梨花节就让女教师当“礼仪小姐”,乃至如今突然要求“市民为国际化学学那”;如果不问问真实的民意如何,“折腾”的命令就下来了,那这叫“国际化”吗?这叫“家长化”,是把市民当小孩子看待,是权力无视权利的惯性使然——大家再想想,这样的“国际化”,还能不能要? (王艳春)

《第三只眼》

想到了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”的口号

这年头凡事都讲究个“与国际接轨”,只是有时接轨心切,慌不择路,一不小心就接错轨,接“出轨”了。西安打造国际化大都市,我看就是很接轨的时候”。

回想起一直喊着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”口号的中国高校,我们又不禁多留了一个心眼。这毕竟是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啊——叫嚣最凶喊喊多年几乎“走火入魔”,嗓子都快哑了,可实效呢?复旦校长认为“中国大学精神虚脱,才子流氓贻害社会”。

(6月22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由此可见,有走向世界的信心和热情是好的,可方式方法也很重要。雄心万丈,还得脚踏实地,不能醉心左道旁门的“速成大法”,而要因地制宜,因势利导。否则,就可能像中国高校那样,光顾着建大楼争经费,硬件一流,软件却可能还没入流。鉴于此,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要想不“走偏”,就必须吸取这种教训。

也许不久西安政府或许就会

出面澄清此事,但这个消息被大家骂得够呛,也带出了一个问

题——为何一提“国际化”,部分人就会产生“全民英语”之类的条件反射?秦时明月汉时关,古都西安,历史悠久。或许正是因为它太古老,所以它才更迫切地进行如此浅表化的国际化?暮鼓晨钟、秦陵汉墓、大小雁塔、汉唐风月,这会是多少没有历史底蕴、没有人文风骨国家和民族,可慕而不可求的?我们何苦要蒙“入宝山而空还”之

羞,徒遭“买椟还珠”之恨呢?

这首先要求我们有文化自信,强说“山寨”的英文并不国际。罗素说:“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”,每个民族、国家或城市,都有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统。一座城市的生活品质、文化内涵和历史魅力,是一座城市的记忆,承载起了我们共同的乡愁。若用山寨式国际化接轨,拆光了中华文明的四合院,置身于庸俗白金汉宫、埃菲尔铁塔包围下,估计同样要为外人和后人耻笑。(邱果果)

《热点纵论》

政府省钱比富豪捐款更紧迫

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、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提出,亿万富翁的社会责任底线应为每年向社会捐款100万元,“现在应当是中国的比尔·盖茨、巴菲特站出来是时候”。

(《京华时报》6月22日)“学习比尔·盖茨、巴菲特好榜样”,倡导中国富豪回馈社会,这原本是好事。但我留意了一下相关的网友评论,却发现,对于此一倡议,叫好、称善的并不多,应

者寥寥,反倒是不乏冷嘲热讽之声,比如“官员更应该捐”“政府少点公款消费比什么都强”。

舆情一至于此,并非没有来由。关于这种“三公消费”节省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具体例证,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新闻中看到,可谓“俯拾皆是”。如据最新报道,山东省粮食局的一份餐厅消费明细显示,“人均1000元的消费标准,12个人一顿总共吃掉14810元”(6月22日《华商报》)……

其实,政府节省之所以比富

豪捐赠更必要紧迫,是因为对富豪来说,“捐赠”说到底不过是一种非强制的道德责任,而对于政府来说,“节省”则根本是一种强制刚性、义不容辞的法律责任。依据《宪法》:“国家厉行节约,反对浪费”,而《预算法》同样要求:“各级预算支出的编制,应当贯彻厉行节约”。这正如原国家审计长李金华曾指出的,“不仅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,还要建立一个‘廉价’的政府”,“公款浪费同贪污腐败一样可怕”。

《热点纵论》

不是谁想“省油”都能买限价房的

海南一个6000多套限价房项目仅仅针对公务员销售,房价约为每平方米3000多元,远远低于周边的25000元每平方米普通商品房价格。海口市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,建设该公寓的初衷是方便公务员上下班,“可节省很多油料”,除五源河公寓项目,海口市今年建设的其他“限价房”也是主要供应给财政供养人员。(《京华时报》6月22日)如今“低碳”正流行,专门针

对公务员隆重推出的“省油版”限价房,看来还真是完全吻合“低碳”理念。公务员当然不应该成为“油耗子”,但“省油”竟然省出了专供公务员的“限价房”,还真是有创意。事实上,公务员之所以会成“油耗子”,并不是因为公务员们住得太远,而恰恰在于没管好公车。真要省油耗其实更应在公车管理上下功夫,没了公车滥用,公务油耗恐怕想不减都难。

不仅如此,需要“省油”的其实不只是公务员,其他企事业单位,那些自掏腰包的私家车主们,又何尝不想省油呢?既然大家都是为了“省油”,当然应该获得同等待遇,限价房周边企事业单位的职工,其实都应该有资格买限价房才是,何以“省油”限价房竟然成了公务员们的独享专利了呢?事实上,一边是25000元每平米的普通商品房,一边则是3000多元每平米的限价房专供公务

员。可见,不是谁想“省油”都能买限价房,所谓“省油限价房”不仅是近水楼台先得利,本质上更是“权力自肥”下的蛋,是赤裸裸的集体腐败。面对可想而知的舆论质疑,当地之所以搬出“省油”这个毫无技术含量的理由,无非就是说明了一点:在公务员变相福利从来都没有责任人被处罚过的习惯下,他们已经不屑于费哪怕一点点心思来编一个有点蒙蔽性的理由了。(吴江)

《异论锋生》

卖酒算啥政治任务?

山西芮城县一村民称,在领粮食直补卡时被要求按户口本上的人头,每人买一瓶洞宾酒,一瓶18元,不买就不能领直补卡。据悉,当地政府为振兴洞宾酒业,要求每个村完成一定额度的销售任务,并在政府大楼内摆放销售排行榜。该镇一位村委主任因任务完成情况不好而受到批评。他对记者说,“虽然是‘政治任务’,可村里没钱。”(6月22日《中国经济周刊》)

在很多地方,“政治任务”正变得越来越多。有的把捐款当成政治任务,有的把读书学习当成政治任务,甚至有的把农民住别墅、为领导的文娛演出等都当成政治任务。政治任务变得越来越多,让很多人糊涂了,究竟什么是政治任务,恐怕没多少人能说得清了。

一些官员为什么喜欢“政治任务”,就是因为一旦上升到政治任务,那么很多事情就好办多了。一是违反法律有了借口。就拿摊派酒来说,一旦上升到政治任务的高度,那么其他的都应当服从这个,违反市场规律也好,地方保护也好,这都不要紧,因为这是政治任务。在任何时候,政治任务都是很重要的。二是可以压制不同意见。一旦成为了政治任务,那么任何人都得无条件服从。即使伤害了老百姓的利益,也要完成。如果有人敢违反、提出不同意见,就是不讲政治,怎么处置都不算过分。

正因为政治任务有这么多好处,再加上目前对什么是政治任务还没有明确的界定,什么是政治任务还由一些官员自己说了算,所以很多官员对政治任务很随便,只要喜欢,什么工作都可以当做政治任务。政治任务的泛滥和随意,不仅让人反感,也削弱了真正的政治任务的严肃性、政治性。一旦所有的任务都变成政治任务,实际上就没有政治任务,或者就是有,也显示不出什么重要性。这个结果,恐怕是那些摊派卖酒任务的官员没想到的。(肖华)

《公民发言》

“食品安全花钱买”是什么混账逻辑

《信息时报》6月22日报道,广东省广州市质监局的有关人士称:“食品安全是买回来的。”他认为,食品要做到安全无毒无害,就必须经过检验、加工、包装等环节,而这些都将计算到食品的价格中。因此,消费者如果想要买到安全放心的食品,就该为安全付费,不能总希望食品价格越低越好。

保证食品的安全需要付出成本,这没错。然而,这个成本其实我们已经付过了。比如按照这位质监人士的意思,“检验”也“将计算到食品的价格中”。请这位质监人士注意,职能部门的职务行为,是纳税人已经支付了成本的,怎么可以再计算到食品的价格中?要说收费,这也是重复收费吧。

我们有专门掌管食品安全的部门和人员,消费者已经为食品安全付过费了。可是,相关部门及其人员“九龙治水”之下还搞出那么多苏丹红辣椒酱、三聚氰胺牛奶、瘦肉精猪肉、石蜡大米、硫磺木耳……非但没有愧色,反而说什么“不能总希望食品价格越低越好”的风凉话,简直就是拿食品安全向市民“开价”,让消费者再出多点钱来买安全,这简直就是强盗逻辑,更丝毫无视自己负责食品安全的责任。在市场上销售食品,监管部门及其人员先不要管它们是贵是便宜,而应先保障它们都是安全的。富人能够吃到更为精心培育的菜,这点穷人并无意见;可是,穷人买点便宜的菜,起码你们也得保障它是安全无毒的啊!

把安全寄托在越来越高的各种费用上,绝不是监管部门应有的思路。这就好比,有关方面不去把车匪路霸打掉,反而提醒司机备多点钱,时刻做好“安全是买回来的”的准备,或者干脆自己收起了“保护费”。这么一搞,有的人倒是安全了、爽了,可普通老百姓,离安全只会越来越远。(李辉)